

马 克 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解 说

(初 稿)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教研室编印

一九七九年三月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第一、二节解说

马克思从一八四三年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到一八五七年，他想写一本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大著作，因而写了这篇《导言》，在当时叫“总的导言”。后来，马克思改变了写作计划，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个《导言》就压下来没有发表。到一九〇二年，马克思已经逝世十九年了，才在遗稿中发现这篇《导言》的手稿，于一九〇三年在柏林《新时代杂志》上首次发表。

在这篇《导言》里，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要点，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革命的变革。这篇《导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之一。

马克思这篇《导言》虽然比较难读，但很重要，写得很深刻，很精彩。我们学习它，不仅对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修正主义，特别是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

2G36/07
路线，是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有重大的意义。

《导言》一共分四节，第一节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二节讲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第三节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第四节仅是一个提纲，看来，马克思是想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对一、二节作些解说。

第一节 生 产

这一节，马克思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一般的、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形态，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形态。

这一节，分三个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1—3段）

第1段，指出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物质生产。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里讲的“对象”应作“问题”去理解，就是说摆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问题，首先是物质生产。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们要生存就要吃饭、穿衣、住房子，这就要进行生产，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还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错误，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才能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2段，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并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点的错误。

“在社会中……当然是出发点”。这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这里说的“社会性质”是指社会形态，生产关系。整句话的意思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从来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任何进行生产的个人都离不开社会，而社会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这些阶段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来划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只能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阶段（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是讲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出发点及其历史根源。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他们抛开一定的社会形态（一定的生产关系）研究物质生产，从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把原始时代的猎人和渔夫手中的棍棒和鱼叉，也说成是资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自古以来就有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虚构的。这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小说家笛福写的鲁滨逊的故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一样，都是虚构的。鲁滨逊一类故事的出发点，绝不象资产阶级文化史家那样错误的认为是反对文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要人们回到原始的自然生活中去，而是相反，鼓励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这种虚构也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把最初社会说成是自由平等的，到了封建社会就不自由平等了，需要建立天生的独立，人们相互关系平等，就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契约）一

样,其目的不是主张毁灭文明,要人们回到自然状态,而是为了反对封建制国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以,斯密和李嘉图的出发点单个的猎人和渔夫也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好,大大小小的鲁滨逊故事也好,都是假象。实际上,他们的出发点和主张都是反对束缚人们独立自由活动的封建制度,为发展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他们的出发点以及他们的主张的历史背景,就是从十六世纪以来就开始了的,到了十八世纪大踏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他们预感到,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了。

“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这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点的阶级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单个的社会成员,同过去的历史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摆脱了自然的血缘联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不再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即不再是依附于一个地主庄园和受某一行会所束缚的人了,资本家可以自由竞争,劳动力可以自由买卖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反映新兴的资本关系的资本家,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然而,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人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把这种“个人”,当作一种理想,认为这种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个人,在历史开头的最初社会里就已经存在,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说法,人生来就是利己主义和要求独立自由的,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是自然造成的,不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斯密和李嘉图完全是以这种理论为依据的,这就充分暴

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只有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由于他出身于贵族，政治上倾向保守，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常常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从封建主义发展而来的，他是比较多的站在历史基础上说话，从而避免了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合乎人类天性的、永恒的、非历史的错误，避免了斯密等人的局限性。

第3段，指出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人生产，在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这是讲在历史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生产。我们越是回顾历史，直至回顾到古代的原始社会，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不是孤立的，越是离不开社会集体的。开始在氏族的家庭中进行集体生产，后来在公社的集体中生产。个人生产根本离不开集体，一旦离开集体，就无力同自然作斗争，无法维持生存，更不存在独立自由的资本家。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变成了商品，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即商品、货币、资本的形式，这些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私人目的的发财致富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但是却采取资本、商品、货币这种物的形式去支配人、统治人、剥削人，“表现为外在必然性”成为一条客观规律。

“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时代……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讲资产阶级学者提出孤立个人的观点，虽然有其时代背景，但是，是不符合生产发展规律的。孤立个人的观点，产生在商品、货币关系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彻底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强调个人

的独立自由活动，允许个人自由买卖，个人经营企业。一般的动物，还可以离开它们的集体而存在，但是，人是最名符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离不开集体，而且只有在社会集体中才能存在，根本不存在什么孤立于社会的个人。退一步说，即使一个人落到荒山野岭中，能够进行生产和生活，也是因为他已经在文明社会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学会了生产的技能和生存的本领，身上带了一些东西去的缘故，纵然这样，也是少见的。如果说，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可能的话，那就象人们不在一起生活不能彼此讲话，而竟有语言的发展一样，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方面无须多说……更加枯燥乏味了”，这是说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把孤立个人的观点写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是必须批判的。马克思历史地对待孤立个人的观点，认为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谬的观点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时期，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摆脱封建束缚，资产阶级学者提出这个观点还有一定历史意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充分展开，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凯里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等人，把孤立个人的观点写进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那就要批判了。特别是蒲鲁东等人，他们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根源，却采取编造神话的手法，历史唯心主义地说什么从亚当和普罗米修斯创造人类那一天起，资本主义就已经存在了，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是和谐的，抹杀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阶级对抗的社会关系，把资本主义制度绝对化和永恒化，这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是必须进行批判的。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4—6段）

第4段，指出生产是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研究生产一般不能忘记各个社会生产的本质差别。

“因此，说到生产，……这种生产事实是我们研究的本题。”这是讲研究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人们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即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因而，对社会生产的研究，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泛泛地考察，而要：或者对社会历史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一个一个的考察，这是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只是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进行考察，这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例如，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我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题。

“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这是说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有它的共性和个性，不能因为共性而忘记研究个性。生产，虽然都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可是，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也有某些共同的地方，相同的概念。如果把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生产的共同点，作为“生产一般”抽象出来，或者概括起来，那也是合理的，有好处的，这样可

以使我们在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时，避免重复。不过，在“一般”中又有各种不同情况、不同的概念。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的，如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这是一切社会的生产都共有的必要的生产条件；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如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则是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后者到社会主义社会所共有的；有些则是最新的时代和最古的时代共有的，如公有制是原始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共有的。没有一般就没有特殊，没有生产一般的要素，如没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反过来，光是有了“一般”，而忘记特殊，也是不行的。正如语言的发展一样，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有它共同的地方，但语言的发展却在于差别性。我们抽出各个历史阶段生产的共同点来，正是为了分析、比较和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之间的本质差别，绝不是要我们忘记它的本质差别，如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任何生产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但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两个生产条件的情况及其结合形式，又是有着本质差别的。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的，不要因为一般而忘记特殊，不要只看到共同点而忘记本质差别的道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特别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锐利思想武器，林彪、“四人帮”就是极力混淆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主义生产的界限，否定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把社会主义生产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搞乱人们的思想，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生产，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窜改。”这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

主义生产看成“生产一般”，抹杀了资本的特殊性。马克思指出，那些证明资本主义永远存在和没有什么矛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庸俗经济学家，他们的全部智慧就在于用空谈“生产一般”，忘记或者有意抹杀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之间的本质差别。他们说什么没有生产工具，任何生产都不能进行，没有过去积累下的劳动（物质资料）任何生产也不可能，把一切历史时代的生产只归结为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进而把资本也说成是一般的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把资本的剥削关系说成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同其他历史阶段的生产的本质差别，完全抛开了生产工具、积累下来的劳动之所以变成资本的那些特殊条件——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对雇佣工人进行剥削。因此，各个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被他们说成“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就是这样，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充满着美妙的纯朴、和谐，至于为什么还会出现许多罪恶和贫困呢？那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手中掌权的人们造成的，应由他们个人负责。显然这是错误的观点。

第5段，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留待别处（后面）再说。”上面已经讲过，“生产的一般”是从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抽出来的共同点。“一般的生产”有两种解释：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本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特殊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把它说成是“一般的生产”；二是“一般的生产”仅是从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说的，是指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等，或者是指这些特殊部门的总体。

没有生产一般就没有一般的生产，可作没有一般就没有特殊去理解，就是说没有生产一般的存在条件，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说没有生产一般的存在条件，也就没有各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生产区分各个特殊部门的事是工艺学的对象，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它不研究这些特殊生产部门的技术方面，而是研究它的社会方面即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至于生产一般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生产部门（如工业、农业）的关系，这里就不说了，留到以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再说。

第6段，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最后……生产的总体。”生产不只是自然方面，单纯生产各种有用物品的特殊的生产，还有社会方面，它始终是一定社会的人们（主体），在一定的生产范围内（窄的、宽的）活动着，各个生产部门彼此联系在一起，即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如何科学的叙述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个《导言》里就不说了。总之，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决不是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从物质形式方面或人同自然的关系方面，考察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而要考察的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不是一般自然关系（7——14段）

第7段，指出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一个时髦的做法是开头搞个总论部分。

“现在时髦的做法，……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

件。”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中，流行着一种新的做法，就是开头总是摆上一个标题为《生产》的总论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就是这样，该书开头第一篇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论生产的必要条件”。

第8、9段，指出其总论部分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进行生产必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而这些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著作开头的总论部分，包括两个内容，其第一个内容，是讲“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们在这个内容里，实际上不过是罗列一切生产的基本条件。看了他们所写的内容，就会知道他们讲的这些基本条件，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概念，一般化的东西，就是这些简单的概念，一般化的东西却被他们说得多罗嗦、重重复复，占了很大篇幅。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讲“劳动的必要条件有二：劳动与适宜的自然物品。劳动是‘肉体的或精神的，说得明白些，是筋肉的或者神经的’；‘适宜的自然物品’，是‘指自然存在或自然生产而适于供给人类欲望的物品’，等等，这显然是同义反复！”

第10段，总论的第二个内容，是“促进生产的条件”。

“如象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这是讲马克思对斯密关于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的看法。在第二个内容里穆勒抄袭了斯密的观点。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是怎样的呢？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说，物

质财富生产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前进的社会，否则，就是停滞的社会。马克思对斯密的这种说法，指出这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提到科学意义上来，那还是不够的，那还要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了解他们在各个时期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然而，这种研究又超出了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这个本题范围了，至于这种研究同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有关方面，那是可以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问题时谈到的。

“照一般的提法，……美国人胜过英国人”。这是讲马克思对当时人们关于斯密提出的问题的流行看法的看法。流行的看法是：一个工业民族的历史发展达到高峰，也就是它的生产发展速度达到了高峰。马克思指出，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当它以谋取利润为主要任务时，它的生产发展速度才是最快的，才是高峰；相反，当它以维护既得利润为主要任务时，它的发展速度就会跌下来，就是说高峰不在于维护已有利润的时候，而在于拼命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由于它已开始走上垄断，以保护既得利润为要务了，生产的发展就出现了停滞的趋势。而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谋取利润为要务，生产发展的速度就比英国快得多，所以就这一点说，美国人比英国人强。

“或者是这样的说法：……财富就越容易创造。”这是讲庸俗经济学家穆勒等人对斯密所提问题的看法。这属于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一国生产力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等主客观因素，是否比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更为有利于生产，即生产物质财富的主观条件（劳动者）和客观条件（生产资料）越是在

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这又是离开社会生产关系，抽象地谈论促进生产的一般条件，所以马克思说：“这又是同义反复。”

第 1 1 段，批判生产只受自然规律支配，分配可以随心所欲的错误。

“但是，这一切……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这是讲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总论中真正要谈的观点。但是，上述的一切，并不是庸俗经济学家在《生产》这个总论部分真正要谈的东西。相反，他们真正要谈的观点是生产不同于分配。参看穆勒著作的观点就清楚了。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财富的生产法则与条件具有物理学真理的性质，其中没有任意选择的要素”。这是讲的生产。分配又怎样呢？他在这本书中说：“财富的分配纯然是人类制度的问题。物品一经在那里，人类（个别的或集体的）就可以随其所欲来处分。他们能以任何条件，将此种物品，归他们所高兴的任何一个人支配……财富分配依存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分配所由而定的规条，是由社会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见及感情制定的。”这种谬论很明显，一方面他们把生产描写成可以脱离社会生产关系，不分历史阶段的单纯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这样就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其他社会的生产之间的本质差别，从而偷偷地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作一切社会生产的一般的自然规律，这显然是庸俗经济学家有意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整套手法。另一方面，他们把分配反而说成是特殊的，好象“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这样就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好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然规律的事情，是不能变动的，也不必去触

动它，只要在分配上作一些调整和改良，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了。下面马克思驳斥了这种分配“可以随心所欲”的谬论。

“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这是马克思对分配“可以随心所欲”的谬论的批判。庸俗经济学家穆勒之流不仅粗暴地割裂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而且根本不了解生产与分配的现实情况，即使这些可以根本不谈，但是下面一点总是应该清楚地看到：分配形式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如何的不同，但是它总是可以象生产那样有着共同的地方、共同的规律。例如，不同社会阶段上的被剥削阶级，作为奴隶、农奴、雇佣工人，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以维持他们的生存；而剥削阶级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和其他的人（官吏、僧侣、教士）则无偿占有一份社会产品，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虽然各都有一份产品，但是数量和质量是根本不同的，这种分配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占有生产资料而得到的一份产品与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得到的一份产品显然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所得的利润是由他占有的生产资料对雇佣工人进行剥削的资本来决定的，而雇佣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他们的工资则是由劳动力的价值来决定的。生产资料占有的情况决定分配的情况，分配决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它的客观规律性的。

学习这一段，马克思对分配可以随心所欲的批判，对我们是有现实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能随心所欲，社会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能随心所欲的，都是有规律的。在社会

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生产力还不高的条件下，决定个人的消费品分配是按劳分配，遵照按劳分配规律办事，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提高，人民高兴，违反按劳分配规律，随心所欲，搞平均主义，就一定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生产上不去，人民不满。

“一切经济学家……答复一下”：这是马克思还要答复的两个问题。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生产》这个总论项目下，还提出了两个要点：（1）财产，（2）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在这两点里，他们有许多谬论，马克思逐点作了批驳。

第12段，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关于财产问题的错误。

“关于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关于第一点，是财产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就是说，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个人进行对自然物的占有，这里，生产本身就包含了对自然物的占有了，因此，再把这种对自然物（财产）的占有，作为生产的一个条件提出来，那就是同义的反复。财产占有的形式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但是，可笑的是，庸俗经济学家把财产的一定形式即私有制的财产形式同财产等同起来，好象人类社会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私有财产，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在历史上，公有财产才是原始形式，而且以公社所有的财产形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在历史上起着显著的作用；私有财产只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才产生的，它是历史的产物，不是财产的原始形式。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占有制下进行的，否则，就没有任

何生产，没有任何社会。没有占有制的占有，是不存在的。

第13段，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关于对既得物的保护的滥调，阐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关于第二点。……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实质上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根本不懂的问题，不懂装懂，谬论不少。马克思阐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产生一定的上层建筑，用以维护经济基础，保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庸俗经济学家却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有机地客观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纯粹是主观头脑中才联系着的东西，从而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上层建筑，说什么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制度下，比在封建制度的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这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粗率与无知。马克思批驳了他们，指出封建制度的强权也是一种上层建筑，有它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是保护封建主私有经济利益的；同时，作为保护私有制的封建制度的法律条款，有些也被资产阶级的国家继续采用了，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第14段，指出国家制度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不是始终相适应的，对生产关系并不是始终起促进作用的。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当一种社会制度刚刚诞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对生产是有影响的，自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生产上的紊乱。

第15段，是第一节的小结。